

# “我”的历史，“我们”的历史——以色川大吉的“本人史”论为线索

安冈健一（大阪大学）

原文为日语，翻译：丁乙

## 序言

20 世纪的战争、殖民地支配与和解是以何种方式被阐述的？对于已有大量研究积蓄的这个问题，我们将有意识地承接前次论坛中的“历史的大众化”问题作进一步探讨。

在本次大会的宗旨中也已阐述，从专家的角度来看，对于 20 世纪东亚历史发展的主要路线并无认识层面的较大争议。但尽管如此，在东亚，对于历史的认识依旧是一个课题。对此，国家的存在发挥了巨大影响力，对于国家而言，何种历史认识能成为可能是个有探讨余地的问题，而这不仅仅关乎各个国家的历史学的形态，也与其中生存着的每一位市民所养育出的历史意识相关联。

这也是为什么在以对社会的历史认识有很大的影响的学校中的历史教育为首，历史学家非常关注市民的历史认知。然而，是否有一些问题被忽略了？虽然我对于“对方的‘历史认识’的认识”还不够充分这一宗旨中的已有的问题提起非常赞同，但是对于自己的社会中所生存的市民的“‘历史意识’的意识”，我认为还有极大的探索的余地。

本文中，我也会参考自身经验，从重视市民书写自身历史的意义的立场，选取现代日本市民的历史意识的一部分进行论述。这里所谓的“历史”这一词汇会从其广义范围进行解释，将关注传统含义中的历史研究的“外部”。在展开论述前，我想先通过规定 1990 年代以后的转折点，即对“经验”这一领域的关注度的上升过程与现今的历史研究相连结的这一转折点，来限定我的探讨范围。

## 1. 关于 20 世纪战争、殖民地支配与和解

20 世纪末，冷战的终结所带来的变动波及各方方面。在日本，自民党的长期政权落下了帷幕，首相对于殖民地支配的歉意的表明等，预告了对战争与殖民地支配的历史的态度的改变。在战后 50 年，此前许多无法得以阐述的个人的战争经验也被重新讲述。

在 1990 年代的日本，关于战争责任问题，哲学家、文学家等参加并进行了积极的讨论<sup>1</sup>。从韩国社会得到的作为日本军慰安妇制度的牺牲者的当事人的证言具有极为强大的冲击力，由此为契机开展了对于证言和资料的发掘活动，有良知的历史学家与活动家们阐明了战时系统性的性暴力的存在。这样的情况也与大众媒体共振，我们可以确认当时的电视与前后的时代相比，给予了战时的迫害问题更多的关注<sup>2</sup>。

<sup>1</sup> 小森阳一、高桥哲哉：《超越国家史》，东京大学出版会，1998 年。

<sup>2</sup> 米仓律《八月新闻与战后日本》，花传社，2021 年。

时代的变化是与历史研究的状态整体联动的。在当时，对于战后历史学的转换期研究带去巨大影响力的研究之一是由西川长夫提出的国民国家（批判）论<sup>3</sup>。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对于西川的论述都存有批判，而在更为具体的、细致的研究得以进展后，进一步带来了与此前不同形态的批判研究，并树立了新论点，可谓是研究的重要成果。

此外，对于国民国家批判的高涨也带来了另一契机，即对于此前处于国民外侧的人们的关心也得以高涨，对其历史的探求得以进展。实际上，在日本的朝鲜人、琉球·冲绳史、阿伊努族史的研究的进展，或与其并行的“帝国的历史”、“殖民地的历史”的讨论的盛行，都给相关研究分野的风景带来剧变<sup>4</sup>。

关于殖民地研究的进展，也给历史教科书中的记叙方式带来变化。日本军慰安妇制度的处理方式等诸多典型问题向来是受人关注的论点，但此外的各方各面也经历着变化，却往往被忽视了。研究者、学生们跨越国界相互往来，通过学习、交流使得先前在国民国家的框架下被探讨的情况产生巨大变化。专家之间的意见不合的情况也显著减少，这也是这一期间的重大成果。

但是，社会本身的变化，也会导致历史学此前重视的学问与社会的关系的质的变化问题。毫无疑问，从个别问题来说，通过自身的历史研究，对于战争牺牲的和解问题作出研究贡献的也存在。比如，就战时中的强制劳动问题，西松建设（旧西松组）与中国人劳动者以及遗族之间的和解问题<sup>5</sup>。与处于劳动现场、作为当今的管理者的中国电力也有交流，由和解问题孕育出的历史的重要性是不可忽视的。然而，从整体看来，在愈发繁忙、体制化的大学中进行的学问与不断流动变化的社会之间的良好关系究竟是什么，依旧是现今不断在摸索中的课题。

作为对这种情况的反应，与其说催生出了新的统合性的研究方法，不如认为是回到了作为实实在在可以共享的，诸如东日本大地震和新冠病毒的流行这样的“事件”和“经验”。“经验”在历史研究中逐渐占据了主要地位，其背景是日本战败后经历了很长时间，有直接经验的一代人也经历变化，导致人们重新审视“我们为什么要继承战争的经验”这个以前显而易见的问题<sup>6</sup>。关于战争与殖民统治的研究也无法再像以前那样进行。

尽管对“经验”的关注日益高涨，但对于非专家而是个人自身的“经验”的记录行为，尤其是对于自身的历史进行书写的行为，目前所得到的学术关注，在历史学的文脉中绝非处于突出地位。

从国际范围来看，与对于记忆问题的学术关注度的高涨相辅相成，人们对自传的关注也水涨船高。口述历史（oral history）的代表研究者，保罗-汤普森从叙述（Narrative）这一点与口述历史的相通性对自传研究的经过发展进行了简要总结<sup>7</sup>。

汤普森指出，1990年代以后，对于自传、信件或日记等个人的书写记录（Life - writing）

<sup>3</sup> 西川有诸多著作，如《国民国家论的射程》，柏书房，1998年。

<sup>4</sup> 关于殖民地研究的成果，可参见日本殖民地研究会：《日本殖民地研究的现状与课题》，雅典社，2008年；同研究会：《日本殖民地研究的论点》，岩波书店，2018年。

<sup>5</sup> 内田雅敏：《元徴用工 通往和解的道路》，筑摩书房，2020年。

<sup>6</sup> 兰信三、小仓康子嗣、今野日出晴：《为何要继承战争经验》，Mizuki书林，2021年。

<sup>7</sup> Thompson, Paul, Joanna Bornat (2017) "The Voice of the Past: Oral History" 4th edi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的学术关注度不断增强。1999年，在中国北京大学的文学研究者赵白生（Zhao Baisheng）的倡议下，成立了 International Autobiography Association。Life Writing 是一个包含自传的极其广泛的类别，近来，牛津大学出版社也出版了由七卷组成的通史性质的研究成果。其最近的一卷涵盖了 1945-2020 年期间<sup>8</sup>。

当然，在日本也存在很多关于在过去书写的自传或笔记的历史研究。近年来，对于个人存留的记录，出现了以“自我文件（ego document）”的称呼进行把握的研究趋势<sup>9</sup>。尽管如此，我还是要重申，目前在进行中的不断产生的个人层面的历史叙事与历史学之间的关系是极其薄弱的。然而，我认为这为包括战争和殖民统治的历史的相互理解留下了重要的参考线索，在下文中，我将讨论市民表达其“经验”的事例。

## 2. 历史的现场

我对于这个问题的看法是，其与“历史的大众化”相关联。谨慎起见，首先需要确认的是，无论历史学本身在世间的关注度是如何低调的，这似乎并不意味着对历史学家的专业知识没有需求。专业的历史学家（如矶田道史、吴座勇一，以及吉田裕）所书写的书籍以数十万册的数量被广泛阅读。这在日本的阅读市场上来说是巨大的。正如此前论坛所指出的，与担负着地方史研究的“准专家”的交流，虽也直面着老龄化的挑战，但仍旧得以维持。

然而，我想关注的是一个在迄今为止的历史学与人之间的关联的延长线上并不存在的领域。在这个领域中，现状是历史学与人们的活动是相背离的，而研究与广义上的、与传统的关注点不同的历史关注没有连结。我想把这种新的关注出现的场所称为“历史学的‘现场’”。

在思考大众化的时候，考虑到在各种内容产业中出现的历史的商品化以及它的消费的侧面是很重要的。然而，我想在这里讨论的是基于市民在生存中所感受到的迫切的必要性、对于广义上的“历史”的关注，以及表达这种关注的作品。

我首先想举的例子是“抗病记录文库”。近年来，在全国各地的图书馆都设立了一个收集抗病记录的区域。所谓抗病记录，指的是记录如何与疾病斗争、回顾斗争经历的作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是当事人的历史。为什么我们需要这样的作品？当谈到关于疾病的标准知识时，最为重要的是学会和专家监督的“科学性的”知识。然而，仅仅如此是不足以让人们信服的。在接受某种治疗的时候，会发生什么虽然可以通过概率给予说明，但这对病人本身的“意义”是无法标准化的。具有不同的情况的个人在对事件解释时，需要接触和学习其他的个体经验的情况并不少见。

其次，一些自治体在积极支持回忆活动，因为他们认为追忆过往具有健康层面上的预防老年痴呆症的效果。在日本中部地区的爱知县的北名古屋市，“昭和日常生活博物馆”通过收集与 20 世纪普通百姓的生活密切关联的物品，并将其提供给当地聚会，来支持回忆计划。老年人们以所收集的过去的物品为线索，进行谈论和倾听。据说这样的活动可以激发人们参加社区活动的意愿。

---

<sup>8</sup> Hayes, Patrick ed. (2022) “The Oxford History of Life-Writing: Volume 7: Postwar to Contemporary, 1945-2020”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sup>9</sup> 长谷川贵彦《自我记录的历史学》，岩波书店，2020年。

最后，鉴于孤独和孤立已然成为社会问题，在关西的京都市，作为对抗老年人的孤独和孤立的对策，为老年人们提供机会在当地聚会上谈论他们的历史的公民活动受到了行政部门的高度评价。

参与以上这些企划的人并不尽是专业学习过历史的人。他们只是从支撑人们的专业角度，关注和利用人们接触其他个体的历史，并从而表达自己的历史的“功效”。这种新兴的、个人化的历史意识的实际需求与历史学之间的距离，处于一种不折不扣的断裂状态。

历史学如何能与这种新的需求相联系？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考虑战争与殖民主义的问题？对此，我想参考1985年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国际人类教育会议（ユネスコ国際性人教育会議）上通过的《学习权利宣言》。

在宣言的开始部分，对学习权做了如下规定。

学习权指的是阅读与书写的权利，是持续提问与深入思考的权利，是想象与创造的权利，是阅读自身的世界与谱写历史的权利，是获得所有教育手段的权利，是发展个人与集体能力的权利。（由国家教育研究所翻译）

它被认为是每个人作为学习者的权利，可以阅读自身的世界，谱写历史。居住在关东地区的神奈川县川崎市的一位在日韩国女性在当地学习认字班习得文字后写下的醒目话语，成为一本关于他们如何拼写、谱写的书名。——“我也是这个时代的一部分”（*Watashi mo jidai no ichibu desu*）<sup>10</sup>。

在这个日本民族中的少数群体集中居住的地区，仇恨言论的恶果层出不穷，因而催生了全国首个规则条例的制定。这样一份写于连生存都会受到威胁的地区的声明，难道不是在叩问我们人们的权利与历史意识之间的联系吗？

### 3. 色川大吉与本人史

谈及谱写历史的权利，如何考虑作者是个重要问题。直到目前为止并非没有人指出这个问题。历史学家色川大吉（1925-2021）在1970年代创造了“本人史”这个术语。此后，“本人史”一词被众多人所接受。为什么它激发了许多人的参与意愿？色川的论点在今天依旧具有值得探讨的重要的意义。首先，我想追溯色川的历史学的脚步，思考他的历史研究的发展，并进一步考虑历史的作家。

色川大吉的以《明治精神史》为首的作为历史学家的工作，现今依旧是日本研究的经典作品，具有重要地位。被称为大众史的历史观，在与社会的对话中不断成型。尤其是1960年的安保条约斗争是一个重要的催化剂。当时在韩国已经发生了一起学生革命，而日本则因为美日安保条约的修订发生了最大规模的群众抗议活动。在中国，以群众动员的方式抗议美日安保条约的修订，也塑造了这一事件的历史意义。作为一名历史学家，色川参与了这一系列的运动，并完善、推敲了他自己对过去的看法。他表示，只有在这个时候，他才能够重新思考由先锋派的领导和群众（以及他们的行动）的框架，而这在此前是不言自明的存在<sup>11</sup>。

---

<sup>10</sup> 康润伊、铃木宏子、丹野清人：《我也是这个时代的一部分》，日本评论社，2019年。

<sup>11</sup> 可见色川大吉：《本人史：其理念与尝试》，讲谈社，1992年所收《六月下了绵延的

基于这一信念，他继续在东京八王子地区进行田野调查，发现了民众自身构思了宪法的事实，1968年在同一地区发现的五日市宪法草案是居住在日本的地方社会的民众在当时的政治背景下如何构思民主主义，以及如何展望下一个社会的代表例。

色川是在与学生和市民共同进行田野调查时遇到了这些罕见的资料。当然，历史学家在田野调查中所遇到的的不仅限于材料。在他所遇见的众人中，包含了与桥本义夫(1902-1985)的相遇。

桥本出生于战前，尤其热爱书籍与历史，在经营书店的同时，也有志于地方文化活动。虽然受到大正民主主义的影响，但他对于战争时期挥舞战时合作旗帜一事，在战后通过《战争责任自述》的完成，列数了自己的罪状，是一位能与内心深处的自我进行对话的人物<sup>12</sup>。

桥本义夫开展了在当地竖立与历史有关的纪念碑等活动，并自1950年代以来，推动当地的人们写下他们的经历或日常感受。随着参与者的增加，在1960年后半叶，终于完成了一本册子。色川目睹了桥本的实践，写下了《现代的常人：桥本义夫论》<sup>13</sup>。

此后，在1970年，他尝试以所处的时代中的个人视角进行捕捉，以本人史这个用语命名了《一份昭和史：关于〈本人史〉的尝试》。为了响应桥本的号召，作为历史学家自身也书写关于自己生活在历史中的经验，也呼吁邀请其他人进行尝试。这本著作荣获了当年的每日出版文化奖，获得了广泛的读者群体。在今天，本人史一词已经普遍化，而其是由一位个性鲜明的历史学家色川大吉发明的。他并不是作为“代表”或“指导”人们的专家，而是作为一位市民在与时代的对话实践中这一点，是与他的安保经验相重合的。

色川的出发点是提出如下主张，即作为经历过昭和时代的战前时期的一代人，应重新考虑自身与实施战争的国家之间的关系。此后，本人史的聚集遍布了包括冲绳和北海道的全国各地，以本人史为对象的自费出版也受到当地出版社的支持得以普及推广。色川自身也积极参与各地区的活动，讨论本人史问题。

此后，自1980年代后，甚至出现了能被称为本人史的产业，其范围广阔，组织展开了形形色色的研讨会。而到了2010年代后，重要报社开始出售用于制作本人史的时间顺序表，记者们也纷纷出动采访本人史书写等项目<sup>14</sup>。在求职和学校教育中，本人史这一词汇的使用也在增加。

#### 4. 本人史与地区史

我意识到，“本人史”的书写这一点实践，归根到底说来是一种探索，去解明与地区、与他人的联系，并且因为这一种个人与地区与国家的历史的关联，它也显示出与历史学有交叉的一面。

作为例子，我想关注与我自身有深刻关联的长野县南部的下伊那地区的历史。尤其是，我将从民俗学家后藤综一郎(1933-2003)的实践出发，即他从1970年代起有意识地将本人史的问题与寻找地方史连结起来，由此联系到明确了满族移民史的市民活动。

---

雨》。

<sup>12</sup> 桥本钢铁二编、桥本义夫：《在暴风雨中》，私家版，1996年。

<sup>13</sup> 色川大吉：《一份昭和史》，中央公论社，1975年所收。

<sup>14</sup> 可见小林多鹤：《被叙述的〈人生〉》，学阳书房，1997年；释七月子《叙说〈本人史〉》，晃洋书房，2020年。

后藤综一郎在明治大学时参与了学生运动，在安保条约斗争后，走上了研究者的道路。他推动了柳田国男（1875-1962）的研究，并试图将民俗学作为一门与地区对话的学科重新思考。

后藤在自己的故乡长野县南部的远山地区与住民们合作，编纂地方史。后藤发挥了其家乡特有的人际脉络，与当地住民们共同编纂了地方史。它可以被看作是村子的本人史。

后藤与当地住民的合作并没有随着历史书的出版而结束，为了使被记录下的村子的历史能成为住民自身的历史，为了能继续学习村子历史，他成立了远山常民（toyamajomin）大学<sup>15</sup>。后藤所提倡的常民大学运动引起了广泛的共鸣，此后，在全国各地建立了多种联系，后藤与全国各地的人们积极进行接触交流。常民大学的实践活动传播扩大到邻近的地方城市，促成了一个名为饭田历史大学的学习组织的形成。后藤在那里进行演讲，他反复强调将地方历史与自身的历史相连结的重要性。

在这里，目标所指向的作为自我理解的地方史与解明自身历史的动向相关联，这其中包括了负面的历史。在饭田历史大学的讲座中，一位在战前曾作为开拓团到过中国的听讲生作了证词，其他与会者都认真倾听。由此，在很长一段时期内都无法得到探讨的从本地区输送出的众多的满洲移民的历史得以阐明。自1980年代至90年代，当地住民开始挖掘自己地区的满族移民的历史，并以此为基础，2000年代以后关于战争历史的采访活动开始走上正轨。

这种动向与饭田市历史研究所这一自治体单位的历史研究专门机构的创建相联动<sup>16</sup>。饭田市有10万人口，为了编纂地方史，聘请了在硕博阶段学习的研究人员作为有聘期的研究者，推进地方史研究。这个历史研究机构与市民的采访活动共同迈进，记录了许多人的证词言论。

在市民组成的叙说满蒙开拓的研究会中，有一些是在大规模自杀中幸存下来并返回家园的人。对参与其中的人来说，谈论悲痛的历史绝非易事。随着时间的逐渐推移，信任感逐渐培养起来，该地区成为一个可以讲述历史的地方。

战后的中日友好运动在该地区也很活跃。从各个方面的相关者处积累到的大量信息材料得以统合起来，其中包括了作为留守中国的日本人的父亲，和作为支持者在全国范围内宣传这一问题的僧侣，他们推动了2010年代的满蒙开拓和平纪念馆的建立<sup>17</sup>。纪念馆中有中日再不开战的纪念碑，是一个蕴含和传承了当地住民的各种记忆和经验的设施场馆。

下伊那地区的实际例子表明了，在书写一个地区的历史时，如何使其成为个人的历史时，当地的住民自身的学习、调查和研究是非常重要的。

## 结语

我于2013年至2015年在饭田市历史研究所担任研究员。在那里，我负责运行一个当地住民参加的研讨会，并由此得以设立一个书写本人史的场所，这也是我长期以来的关注点所在<sup>18</sup>。

---

<sup>15</sup> 地域文化研究会：《扎根地区的民众文化的创造》，藤原书店，2016年。

<sup>16</sup> 关于饭田市历史研究所，参见饭田市历史研究所网页。

<https://www.city.iida.lg.jp/soshiki/39/>

<sup>17</sup> 参见满蒙开拓和平纪念馆（阿智村）网页。<https://www.manmoukinenkan.com/>

<sup>18</sup> 作为研讨会记录，参见安冈健一：《从〈个体〉的历史看地区：从〈本人史〉重新审

我想举一位有中国血统的女性所写的本人史为例<sup>19</sup>。为书写本人史而参与研讨会的相泽莉依女士的母亲是留守中国的妇女。相泽女士出生于战后的中国，在当地长大，并得到了大学里教员的工作，但至 1990 年代，她决定追寻她母亲的根源来到日本。她随后搬来了日本，一边工作一边学习日语。

她所写的本人史《幸——被幸运与幸福所包围的平凡人生》(2016 年)追溯了她的半生，记录了一位女人如何跨越日本与中国的生活的经历。无论这个地区的历史研究如何兴盛，如果没有她自己的写作，这本一半是中国历史、一半是日本历史的书籍就不会诞生。即使进行了采访，若非听众同时熟悉这两方的历史也无法理解其经验的完整情况。能够全面追踪这一独特途径的首当其冲的是当事人相泽女士本人。这本书在 2021 年获得了《女性文化奖》，这具有象征意义，说明了地方的历史文化能通过由不同经历根源的当事人的描绘而得以丰富的可能性<sup>20</sup>。

共同参与研讨会的人们也遇到了相泽女士，一位中国归国人员，再次成为一个可见的存在。相泽女士的例子表明，如果我们作为承载历史的主体，相互交谈的空间如果能以公开的方式构建，我们实际上可以构建的是一个适合当今跨越诸多边界的全球化市民的历史意识。在某个地区共同生活的“我们”之中，流淌着并汇合着众多的历史支流。通过“我”的历史的书写，经由分享，得以产生“我们”。

全球史的问题提起对我们做出了以下要求，即要求我们对民族国家框架的固定化、并对其中被同质化的想象力进行批判性的重新审视<sup>21</sup>。具体的线索在何处？我们所探求的并不仅仅是与对历史学迄今为止所积累的过去本身，还可以参与创造一个“历史’领域’”，它伴随着一种将战争与殖民统治的历史与每个人的人生相连结从而了解自己的愿望。

我认为，除了目前为止的历史学已有的作用，即充当指摘问题的检察官和作出判决的法官的作用之外，其还应该发挥新作用，如律师般能支持实现人们的权利的作用。我认为，这种角色如果成为可能，那我们能够与其他专业人员、抑或许多非专业人员合作，培养下一代的、更为广泛的历史研究的承担者。

我们可以设想多种可能的“现场”的形式，诸如来自不同国家的年轻人们与历史学家一起工作，书写包括家族史的本人史的研讨会等。如此，如果对于谱写每个人的历史的权力得以实现，从历史学的分期来说，尤其是对与现今相连接是现代史所承担的功能得以添加的话，这不将会促进跨越国界的对话，进一步提高目前已有的历史学对市民的贡献吗？若我们都能直面所处社会的“此时此地”的历史意识的性质，那无疑会有助于丰富我们未来的对话可能性。

---

视》，《饭田市历史研究所年报》，16 号，2019 年。

<sup>19</sup> 安冈健一：《从本人史看满洲记忆与地区史研究的可能性》，佐藤量、菅野智博、汤川真树江：《战后日本的满洲记忆》，东方书店（售卖）2020 年 4 月。

<sup>20</sup> 《女性文化奖获得者 在饭田的遗留中国的日本人 2 代人相泽女士 关于和平的所思 由日语的书写》，《信浓每日新闻》，2021 年 10 月 19 日。

<sup>21</sup> Sebastian Conrad（小田原琳翻译）：《全球史：为了批判性的历史叙述》，岩波书店，2021 年。

■ 安冈健一 (YASUOKA, Kenichi)

2004年京都大学农学部生物资源经济学科毕业。2006年京都大学研究生院农学研究科硕士毕业。2009年京都大学研究生院农学研究科博士课程毕业。获京都大学博士(农学)学位。现任大阪大学研究生院人文学研究科副教授。专业为日本近现代史,口述史。

主要著作:《“他者”们的农业史》(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2014年)。《以共生的“伙伴”为目标》(高谷幸编《多文化共生的实验室:从大阪思考》青弓社,2022年)。《听取/口述史》(岩城卓二等编《论点·日本史学》Minerva书房,2022年8月)。